

研究与探索

朝鲜半岛发现的明代青花瓷器 及相关问题研究

金银珠 陈天民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北京, 100091)

明与朝鲜是山水相连的邻邦, 在以大明为核心的朝贡体制下相互依存。有明一代, 景德镇生产的青花瓷器凭借着精良的制瓷原料和工艺, 吸引了善制白瓷却缺乏钴料的朝鲜王国, 被朝鲜贵族士庶视作稀有的礼器、奢侈品。朝鲜半岛自此掀起了一阵青花瓷之风, 这一风潮不仅刺激了朝鲜广州官窑青花瓷的诞生与发展, 更对其社会各阶层的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朝鲜半岛考古遗址和图像资料所见明代青花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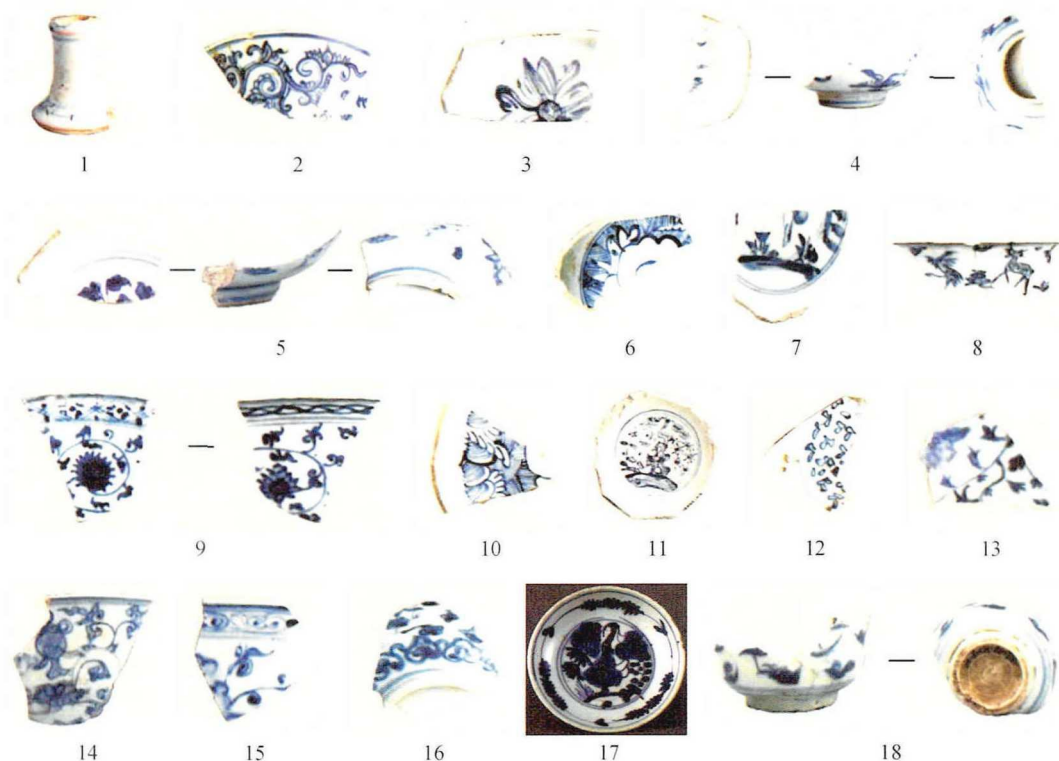
迄今为止, 在朝鲜半岛公布的考古资料中, 明确出土有明代青花瓷的地点分布在韩国全境, 包括首尔汉城府、汉城府外及京畿地区、庆尚道、忠清道、江原道、全罗道及济州岛, 本次收集共175件。

(一) 首尔汉城府

汉城是朝鲜王朝的都城所在, 位于韩国西北部, 坐落于汉江以北, 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明代青花主要出土于城内各类衙署、商业中心及达官显贵的居住区等, 标本共计77件。

东大门运动场遗址^[1]: 2008年5月至2009年7月, 中原文化财研究院在首尔中区乙支路七街一带的东大门运动场、历史文化公园开展了发掘工作。地层时代为朝鲜前期至

近代,出土遗物以瓷器为主,兼有砖瓦、金属器其他近代遗物等。朝鲜时代的遗迹包括军队训练院驻地、下都监建筑、城郭、集水池和各类居址等,出土有明代青花瓷残片18件,包括碗15、盘1、杯1、高足杯1件(图一,1~18)。



图一 首尔东大门运动场遗址出土明代青花瓷

1. 正统至天顺 2~16. 成化至正德 17、18. 嘉靖至隆庆

清进洞遗址^[2]:地名来源于都城内澄清坊、寿进坊的合称。朝鲜时代,两坊内设有司仆寺、义禁府、议政府等各类中央衙署。遗址出土的明代青花年代跨度较大,根据遗址基本判断为15世纪晚期至17世纪早期。标本有38件,包括碗24、盘10、壶1、杯1、罐1、高足杯1件(图二,1~19;图三,1~19)。

钟路一街遗址^[3]:发掘者据19世纪绘制的《朝鲜京城图》,推测其为都城市廛的布铺、苧铺。遗址出土有明代青花碗残片9件(图四,1~9)。

庆熙宫遗址^[4]:16世纪末壬辰倭乱期间,汉城的宫殿和官府被焚毁。万历四十五年(光海君九年,1617年),朝鲜王为了镇压宣祖第五子定远君宅院的王霸之气,在其宅院废墟之上建造了离宫庆德宫(庆熙宫旧称)。庆熙宫遗址出土有青花缠枝花卉纹盘残片1件(图五,1)。发掘者认为出土青花的I-11探方地层属于庆熙宫创建以前的遗址,因此,这件青花应该是在定远君宅院内使用的。



图二 首尔清进洞遗址出土明代青花瓷

1~19. 成化至正德

除以上遗址外,青花瓷的其他出土地点主要集中于今首尔光化门路与邮政路之间,包括中区茶洞、乙支路、长桥洞等,紧邻景福宫、钟阁遗址。1412年,根据《周礼·考工记》“前朝后市”的营造理念,朝鲜官方于景福宫后设置店铺大街,1414年工程结束,建成店铺共约2027间。这一格局基本保留到了日本殖民统治时期。近年来因城市改造,这一区域遗址发掘较多。2015年11月,中区茶洞53-8地点发现建筑遗迹和各类排水设施,第3层(朝鲜时代前期)建筑基址中发现明代青花岁寒三友纹碗残片1件^[5](图五,2)。乙支路各地点出土了明代青花7件,碗3、盘4件^[6](图五,3~9)。长桥洞各地点出土明代青花瓷3件,碗2、盘1件^[7](图五,10~12)。

(二) 汉城以外的京畿地区

首尔汉城以外及环绕的京畿道是朝鲜时代王畿的外围,西邻黄海,与山东半岛隔海相望。王室贵族所属的众多寺庙、窑场、园圃、墓葬及拱卫汉城的大小山城皆位于此。出土明代青花瓷共计61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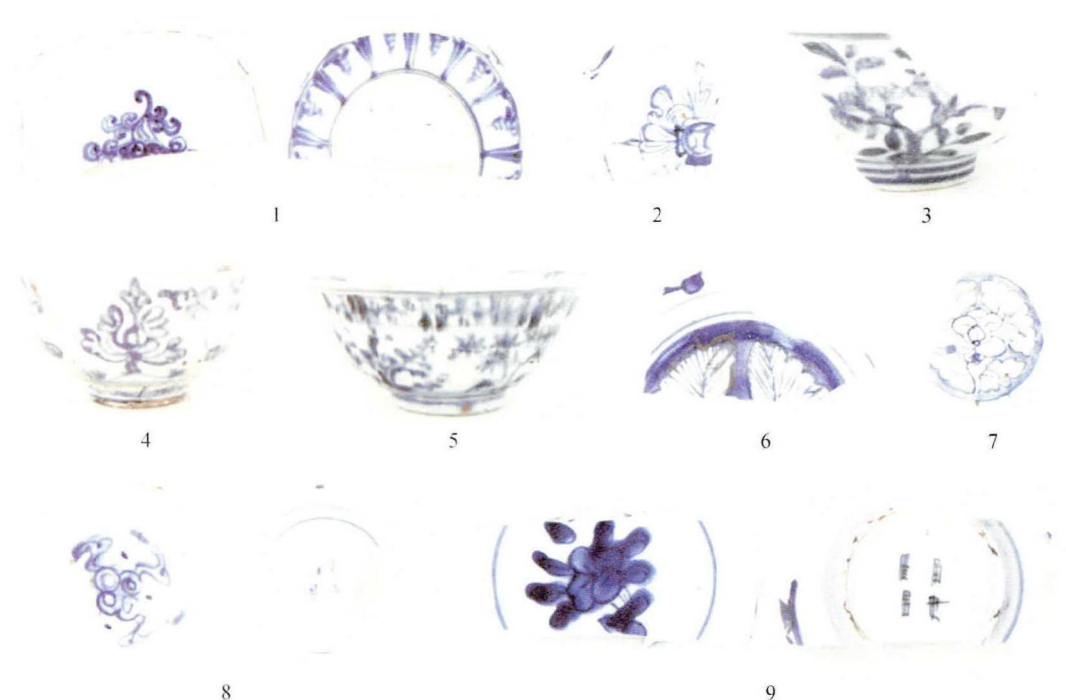
图三 首尔清进洞遗址出土明代青花瓷

1~16. 嘉靖至隆庆 17~19. 万历至崇祯

扬州市桧岩寺遗址^[8]：据圆证国师塔碑和《东国輿地胜览》等记载，桧岩寺创建时代大约在12世纪，是高丽末朝鲜初的王室寺庙。朝鲜太祖、孝宁大君、贞熹王后曾先后多次在此礼行佛事。桧岩寺出土明代青花瓷残片数量较多，年代范围为15世纪中期至17世纪早期，共19件，包括碗16、盘2、瓶1件（图六，1~19）。

广州市朝鲜官窑：自明成化三年（朝鲜世祖十三年，1467年）在广州民窑的基础上开始设立，是专门为王室生产宫廷用瓷的窑场，生产有白瓷、青花、铁绘等品种。历年发掘出土明代青花的地点有道马里Y1^[9]、牛山里Y15和Y9-3^[10]、樊川里Y5^[11]，收集残片共11件，碗9、盘2件（图七，1~11）。窑址发现的明代青花与朝鲜白瓷、青花等产品有同出的现象，推测广州官窑存在对明青花瓷的研究和仿制。

高阳市淑慎公主墓^[12]：淑慎公主是朝鲜孝宗大王李湔（即位前为凤林大君）与仁宣王后张氏的嫡长女，生于1634年。明末清初战乱，幼年即随父母及其他宗室成员入清为质，先后流浪沈阳、北京。1645年，回国后不久去世，年仅十二岁，作为温陵的陪陵墓原葬于京畿道高阳西山，日本殖民时代（1936年）迁葬于现今首尔的西三陵。墓葬



图四 首尔钟路一街遗址出土明代青花瓷

1~5. 成化至正德 6、7. 嘉靖至隆庆 8、9. 万历至崇祯

未经正式发掘，出土物是迁陵过程中的遗留，其中明代青花瓷6件，包括圆盒2、四方和八方盒2、盖罐2件（图八，1~6）。器物款识、年代明确，1件嘉靖，其余5件万历，据笔者专文考证，这些瓷器属于官搭民烧产品，来源于清顺治帝携朝鲜质子入关后，赏赐给淑慎公主的明代宫廷旧藏。

其他墓葬：2006年9月至2007年10月，韩国中央文化财研究院发现恩平新城区津宽外洞石室墓1处，朝鲜时代墓葬3459处。出土遗物有白瓷碗、粉青沙器、青花瓷、青铜器、朝鲜通宝等，陶瓷298件，金属器835件，玉石类297件。其中，明代青花瓷2件，分别为盒盖、碗各1件^[13]（图九，1、2）。坡州市汶山邑堂洞里8地点2号朝鲜时代土圹墓出土青花婴戏图纹碗1件^[14]（图九，3）。水原市灵通区二仪洞6-1地点3号土圹墓出土青花缠枝宝相花碗1件^[15]（图九，4）。水原市华城卧牛里15号土圹墓出土青花缠枝花卉纹碗2件^[16]（图九，5、6）。从这些墓葬出土的当时贵重的朝鲜白瓷、青铜、玉石等来看，墓主人应出身于豪富之家。

扬州市广沙里居址^[17]：该居址具体信息不详，有学者推测其为普通居址。出土明代青花2件，分别为碗、盘各1件（图九，7、8），现藏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龙仁市壬辰山城^[18]：城址位于壬辰山顶，沿汉江支流的炭川与丰德川分布，自古以来就是守卫京畿地区的交通要道。高丽到朝鲜时代，契丹、蒙古、倭寇等外敌先后



图五 汉城出土明代青花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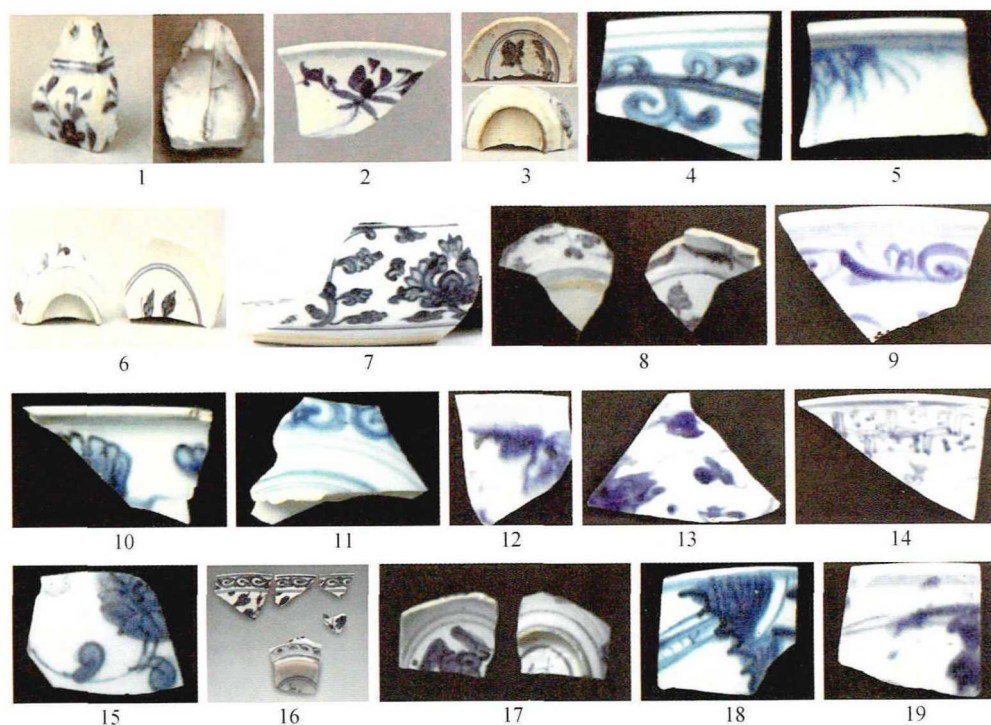
1. 成化至正德(首尔庆熙宫遗址出土) 2. 成化至正德(首尔中区茶洞53-8地点出土) 3~8. 成化至正德
9. 嘉靖至隆庆(首尔乙支路) 10、11. 成化至正德(首尔长桥洞) 12. 万历至崇祯(首尔长桥洞)

入侵汉城时,各方都习惯在此设伏。1997年,京畿道博物馆对山城开展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出土的遗物年代跨度较大,从青铜时代到朝鲜时代。朝鲜壬辰倭乱时期,此地是倭军和朝鲜军的激战地点,出土有铳筒、砖瓦、朝鲜白瓷及明代青花碗2件(图九,9、10)。

松坡、金浦、高阳、坡州、东豆川、乌山、安城、骊州、龙仁等地在多年的城建过程中均有出土明代青花瓷器,共有碗14、盘1件(图一〇,1~15)。出土的具体地点和遗址不详,分别藏于各地博物馆^[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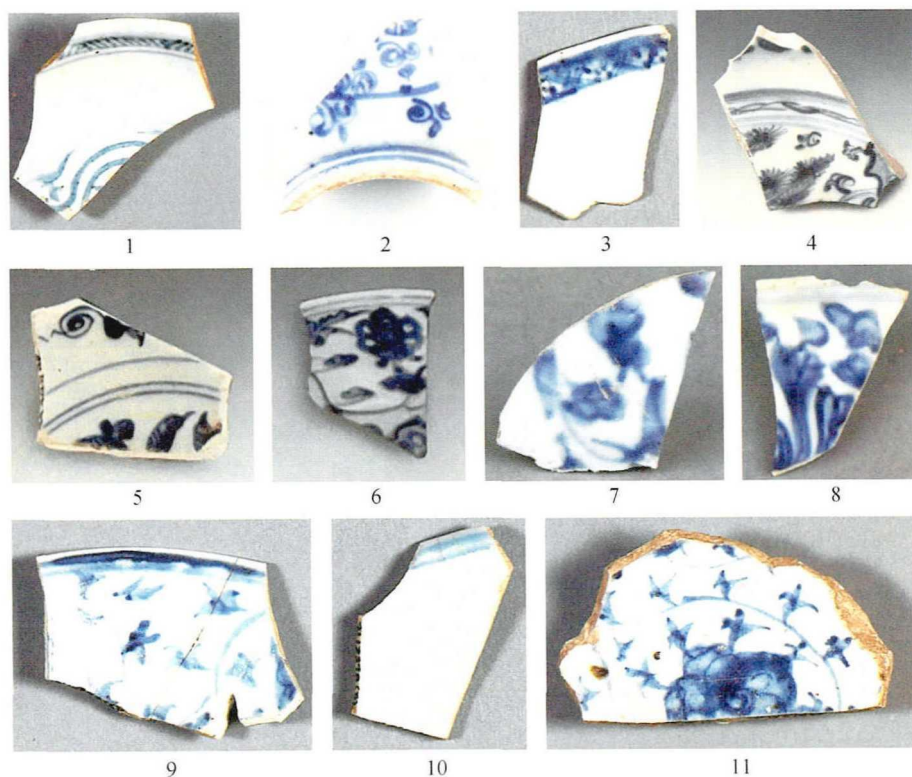
(三) 庆尚道

庆尚道位于朝鲜半岛东南沿海地区,现今为庆尚北道、庆尚南道、釜山市、蔚山市辖区,与对马岛、日本群岛隔海相望。沿海一带与倭人交流密切,多存有倭馆、军事城镇等遗址,出土明代青花瓷15件。



图六 杨州桧岩寺遗址出土明代青花瓷

1~3. 正统至天顺 4~14. 成化至正德 15、16. 嘉靖至隆庆 17~19. 万历至崇祯



图七 广州官窑出土明代青花瓷

1~11. 成化至正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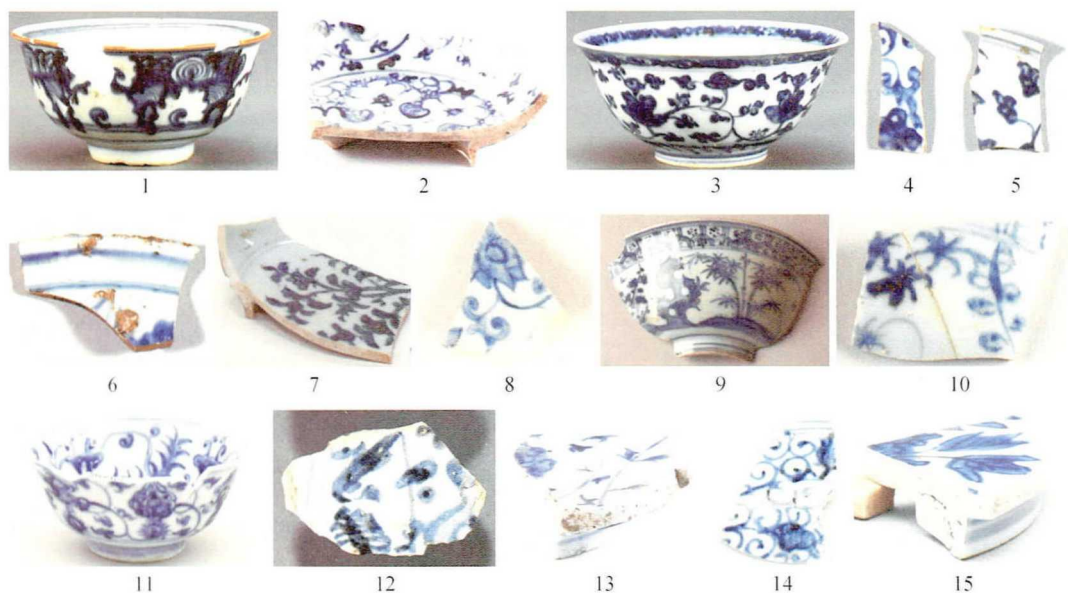
图八 高阳淑慎公主墓出土明代青花瓷

1. 嘉靖 2~6. 万历



图九 京畿地区各类遗址出土明代青花瓷

1、2. 成化至正德(恩平新城墓葬群) 3. 成化至正德(坡州汶山邑堂洞里8号地点M2) 4. 成化至正德(水原灵通区二仪洞6-1地点M3) 5、6. 成化至正德(水原华城卧牛里M15) 7、8. 成化至正德(扬州广沙里居址) 9、10. 万历至崇祯(龙仁王辰山城)



图一〇 京畿地区城市遗址出土明代青花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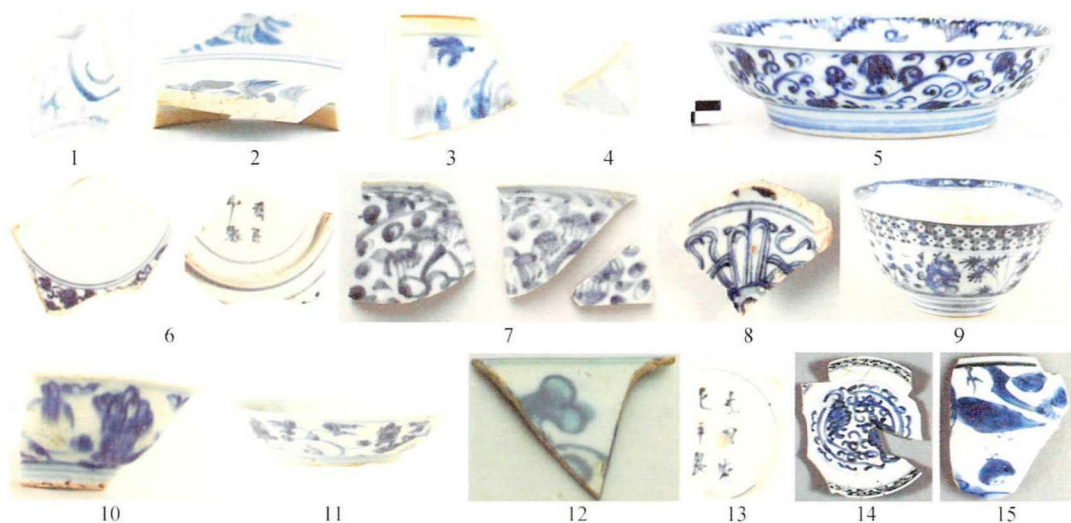
1. 正统至天顺（金浦） 2~14. 成化至正德（2~6. 金浦；7. 松坡；8. 高阳；9. 坡州；10. 东豆川；11. 乌山；
12. 安城；13. 骊州；14. 龙仁） 15. 万历至崇祯（龙仁）

吕原市镇海区莽德洞321遗迹^[20]：发掘者推断该遗址是永乐五年（朝鲜太宗七年，1407年）朝鲜对日本开放时设置最早的熊川乃而浦（莽浦）倭馆。倭馆常驻有对马岛的驻外人员、日本使臣和琉球使臣，在政府的监管下每月举行6次贸易。宣德九年（朝鲜世宗十六年，1434年），朝鲜王修筑熊川邑城；正统八年（朝鲜世宗二十五年，1443年）对日本人开放三浦；正德五年（朝鲜中宗五年，1510年）乃而浦、对马岛的倭人合力举行暴动，短期占领了乃而、熊川两城，之后朝鲜限制倭人的活动范围；嘉靖二十三年（朝鲜中宗三十九年，1544年）因庆尚南道蛇梁镇（今统营市）发生倭变，当地政府关闭了乃而浦倭馆。倭馆遗址出土明代青花瓷残片共4件，碗3件，高足杯1件（图一一，1~4）。

龟尾市珍坪墓^[21]：具体信息不详，出土精美完整的青花缠枝花卉纹盘1件（图一一，5）。

釜山市加德岛^[22]：位于朝鲜时代的两大港口，富山浦与熊川乃而浦之间。自高丽时代始，该岛就是东南沿海的重要防御点之一。岛西南端沿着山脊线设有天城镇。1592年，天城镇城被日本军队攻陷，成功为日本军队驻屯地之一。《朝鲜王朝实录》在16~17世纪关于加德岛的记事较多，内容主要是当时倭人频繁的骚扰^[23]。城址出土“大明成化年制”盘底残片1件（图一一，6）。

东莱、机张、安东、漆谷、蔚山、山清、统营、密阳、水营等城市出土的明代青花碗4、盘5件（图一一，7~15）。出土的具体地点和遗址不详，分别藏于各地博物馆^[24]。



图一一 庆尚道各类遗址出土的明代青花瓷

1、2. 正统至天顺(昌原茅德洞321号遗迹) 3、4. 成化至正德(昌原茅德洞321号遗迹) 5. 成化至正德(龟尾珍坪墓) 6. 万历至崇祯(釜山加德岛) 7~10. 成化至正德(7. 东莱; 8. 机张; 9. 安东; 10. 漆谷) 11、12. 嘉靖至隆庆(11. 蔚山; 12. 山清) 13~15. 万历至崇祯(13. 统营; 14. 密阳; 15. 水营)

(四) 忠 清 道

忠清道分南、北两道,位于韩国中西部沿海地区,京畿道以南,全罗道以北。共计出土明代青花瓷13件。

清州市龙亭洞M103²⁵:龙亭洞Ⅱ区遗址共发现168座高丽时代以后的土坟墓,发掘出土瓷器92件,铁器322件,青铜器112件。瓷器以朝鲜白瓷为主,兼有少量的粉青沙器。其中103号墓出土有青铜钵、青铜勺子、珠饰,明青花莲托八宝纹碗1件(图一二,1)。墓葬性质与前述京畿道其他墓葬一致,墓主人非富即贵。

镇川、阴城、忠州、牙山共出土碗11、高足杯1件²⁶(图一二,2~13),具体信息不详。

(五) 江原道、全罗道及济州岛

两道一岛虽地域广博,但出土的明代青花瓷总计仅9件²⁷,且具体信息不详。江原道位于韩国东北沿海,下辖的原州、宁越出土碗4、高足杯1件(图一三,1~5);全罗道及济州岛位于西南沿海,下辖的罗州、海南、全州、济州出土碗共计4件(图一三,6~9)。

此外,除考古出土品,朝鲜礼书中的图像资料也可觅得明代青花瓷的踪迹。正统九年(朝鲜世宗二十六年,1444年),朝鲜官方根据太宗朝已行之典礼,兼取唐宋旧礼



图一二 忠清道各类遗址出土明代青花瓷

1. 成化至正德（清州龙亭洞M103） 2. 正统至天顺（镇川） 3~13. 成化至正德（3. 阴城；4. 忠州；5~13. 牙山）



图一三 全罗道及济州岛城市遗址出土明代青花瓷

- 1~5. 成化至正德（1~4. 江原道原州；5. 江原道宁越） 6. 成化至正德（全罗道罗州） 7. 万历至崇祯（全罗道海南） 8. 正统至天顺（济州岛） 9. 嘉靖至隆庆（全罗道全州）

及明朝之制，颁布了立国的“五礼仪”（吉、嘉、宾、军、凶）。其中，在嘉礼的礼器图“尊爵”中，可见“白磁青花酒海”一件^[28]，与宣德官窑青花云龙纹罐别无二致（图一四，1、2），极有可能就是宣德五年御赐的“青花云龙白磁酒海三个”之一（见表一“宣德五年”文献），最终被朝鲜王室奉为婚礼活动的嘉礼器。

根据上述遗址的年代，结合有关学者的分期研究^[29]，我们将本文收集的标本大致分为五期：



图一四 宣德官窑青花瓷的图像与实物对比图

1.《朝鲜王朝实录》绘制的“白磁青花酒海” 2.宣德青花云龙纹罐(日本出光美术馆藏)

明初一洪武至宣德(参阅图一四, 1、2);

明早期—正统至天顺(参阅图一, 1; 图六, 1~3; 图一〇, 1; 图一一, 1、2; 图一二, 2; 图一三, 8);

明中期—成化至正德(参阅图一, 2~16; 图二, 1~19; 图四, 1~5; 图五, 1~8、10~11; 图六, 4~14; 图七, 1~11; 图九, 1~8; 图一〇, 2~14; 图一一, 3~5、7~10; 图一二, 1、3~13; 图一三, 1~6);

明晚期—嘉靖至隆庆(参阅图一, 17、18; 图三, 1~16; 图四, 6、7; 图五, 9; 图六, 15、16; 图八, 1; 图一一, 11、12; 图一三, 9);

明末—万历至崇祯(参阅图三, 17~19; 图四, 8~9; 图五, 12; 图六, 17~19; 图八, 2~6; 图九, 9、10; 图一〇, 15; 图一一, 6、13~15; 图一三, 7)。

二、朝鲜王朝获取明代青花瓷的途径和来源

考古、图像资料的发现为我们管窥明青花瓷在朝鲜国内的消费情况提供了线索。《明实录》《朝鲜王朝实录》《历代宝案》等中外汉文历史文献进一步揭示了朝鲜获取这些青花瓷的各种途径和来源。下面笔者就整理的相关文献制成年表(表一)。

表一 明、朝鲜、琉球三国汉文典籍记载朝鲜输入青花瓷的来源和途径

纪年	年号	文献内容	来源
朝贡贸易途径（明朝赏赐，日本、琉球进贡）			
1423	永乐二十一年（朝鲜世宗五年一月二十八日）	日本国前九州总管源道镇修书于礼曹，谢还被虏人口，兼求佛寺钟，仍献硫黄五千觔……花磁酒器二…… ³⁰	日本进奉
1428	宣德三年（朝鲜世宗十年七月十九日）	……今赐王白素磁器十桌、白磁青花大盘五个、小盘五个，至可领也。 ³¹	明朝赏赐
1428	宣德三年（朝鲜世宗十年七月二十五日）	上率王世子及百官，拜谢恩表笺……表曰……白磁列案，实分内帑之珍；青花满盘，光照弊邦之陋。 ³²	明朝赏赐
1429	宣德四年（朝鲜世宗十一年一月二十七日）	使臣进段子，罗纱……青画白磁钟，白磁画钟…… ³³	明朝赏赐
1429	宣德四年（朝鲜世宗十一年六月十日；七月十五日）	乙酉，大护军尹重富，进白磁青花大钟一事，赐米豆二十石 ³⁴ ；己未，李彬妻进青花磁器及螺杯，赐米豆粒三十石。 ³⁵	朝鲜个人进奉（尹重富、李彬妻）
1429	宣德四年（朝鲜世宗十一年十一月二日）	上率王世子及百官，幸太平馆，设下马宴。使臣进白磁青花大碟四事。 ³⁶	明朝赏赐
1430	宣德五年（朝鲜世宗十二年七月十七日）	乙卯，上率群臣，迎敕于慕华楼……今特遣中官昌盛尹凤……颁赐……青花狮子白磁桌器三桌、青花云龙白磁酒海三个。 ³⁷	明朝赏赐（昌盛、尹凤）
1447	正统十二年（朝鲜世宗二十九年九月一日）	赐青画沙大钟二事……于四部学堂诸生……太宗以成均馆为龙潜始仕之地，赐青画沙大钟，馆中相传为宝…… ³⁸	明朝赏赐（永乐、正统朝）
1450	景泰元年（朝鲜文宗元年八月五日）	郑善诣阙，上迎于勤政门内……善进段子五四……青画钟六事、画榼二事…… ³⁹	明朝赏赐（郑善）
1450	景泰元年（朝鲜文宗元年八月六日）	尹凤，进锦犀玛瑙带一腰……青画白钟五事、紫色钟六事、画碗十事……青画沙盘九事、青画台盏一事……郑善，进段子三匹……青画白提碗十事，内宫，罗一匹……青画茶钟六事。 ⁴⁰	明朝赏赐（尹凤）
1470	成化六年（朝鲜成宗元年）	琉球国王尚德奉复朝鲜王朝陛下……白地青花盘二十个，白地青花碗二十个，青盘二十个，大青碗五十个，小青碗一百个…… ⁴¹	琉球进奉
1655	清顺治十二年（朝鲜孝宗六年七月十三日）	太宗大王（登基于建文二年，1400年）在前朝，为国子博士，行酌于馆中，有青花盏。太宗即位，仿本馆宝藏之……至成庙朝，乃破缺，成庙乃命改造，而见失于壬辰之乱。 ⁴²	明朝赏赐（洪武或建文朝）
私人贸易途径（禁令之前的合法贸易，禁令之后的走私贸易）			
1447	正统十二年（朝鲜世宗二十九年九月九日）	禁约两京并陕西河南湖广甘肃大同辽东沿途驿递镇店军民客商人等不许私将白地青花瓷器皿卖与外夷使臣。 ⁴³	明朝使臣、军、民、客商

续表

纪年	年号	文献内容	来源
1448	正统十三年（朝鲜世宗三十年三月三日）	传旨礼曹：中朝禁青花磁器，卖与外国使臣，罪至于死。今后赴京及辽东之行，贸易磁器，一皆禁断。 ^[44]	朝鲜使臣
1477	成化十三年（朝鲜成宗八年二月十三日）	辛亥……大司宪金永濡启曰：青画磁器已禁用，但大臣戚里好用之……请申飭禁止……领事沈浚曰：臣意谓使臣之还，时遣御史往察，则此弊自无矣；传旨议政府曰：……比闻勋戚贵近先自坏法，闾巷小民，亦相率而侈靡，其中巨商富贾，纵情无忌，习以为俗，至如画磁器，非土产也，而求买上国，其不畏邦宪如此……自今有乖式令者，明加纠察，痛行禁断。 ^[45]	朝鲜使臣
1498	弘治十一年（朝鲜燕山君四年六月十五日）	庚辰，命议礼曹所启禁制奢侈节目……金银青画白磁器……《大典》已有禁令，司宪府申明痛禁。 ^[46]	重申禁令
1509	正德四年（朝鲜中宗四年一月二十七日）	下谕于平安、咸镜观察使节度使曰：边方守令，不专意武事，而徒尚侈靡……横费其价，载输于京，本土不产磁器等物，无不贸去……痛革此弊，使之专委武事。 ^[47]	朝鲜边境军官

明代景德镇生产的青花瓷凭借着质量精良，独一无二的属性，成为东亚各国之间政治外交馈赠的礼品，私人在禁令前后谋利或牟利的商品。表一显示，朝鲜输入青花的途径有朝贡贸易、私人贸易，再结合壬辰山城等军事遗址的发现，军事战争也是一个重要途径。在这样一个政治、经济、军事的大框架下，年表涉及的很多具体来源问题仍需补充。

第一，朝鲜人尹重富、李彬妻个人向朝鲜王进奉青花瓷的来源问题。宣德四年，青花瓷在中国被皇家绝对垄断，一般只能由皇帝赏赐，经使臣携带而流通海外。这就意味着使臣对于这些赏赐品存在着可操作性。正常情况下，就出使朝鲜而言，明使一路护送礼品到汉城后，会在正式场合向朝鲜王宣读圣旨并移交赏赐，不会铤而走险私自处理公物。但通过文献，我们找到了这个动机。明使尹凤、朝鲜官员尹重富、李彬妻三人之间其实存在密切的亲戚关系，尹凤实际是朝鲜人，尹重富为其弟^[48]，李彬妻又是尹凤的养母^[49]。正是凭借这层关系，尹重富、李彬妻得以从尹凤处获得宣德青花，而后私自进献给朝鲜王，用以牟取某种政治经济利益。

此外，明使有时还以个人名义进贡，并索要回礼。朝鲜效仿大明朝贡礼制，对于进贡来者也必以丰厚的土产作为回报^[50]，长此以往便形成了明使获利的一种方式。早在元朝，就有大量高丽人来到中国为官，明朝延续了这个传统，尤其是宦官队伍里有不少朝鲜人，这些人因为语言文化等优势，经常被明政府作为使者特派到朝鲜国。到了朝鲜，他们便积极利用天朝赋予的特权大肆索取，尹凤就是其中的代表^[51]。

第二，日本和琉球向朝鲜进贡青花瓷的来源问题。明代早中期，琉球和日本尚未

掌握青花瓷的制造技术,所进贡朝鲜的物品无疑是来自明朝的。在当时,东亚形成了以琉球为中心,涉及明、朝鲜、对马岛、日本之间复杂的多边官私贸易。朝鲜和琉球两国在大明的朝贡体制下常常被予以特殊优待,不仅赏赐丰厚,而且在北京接受明廷赏赐以后,还准许于会同馆开市贸易不受时间限制等等^[52]。于是,琉球以及日本(彼时不受明朝待见,但又掌控琉球)便利用从大明获取的青花瓷器进贡朝鲜,获得朝鲜王的回赐。不仅如此,日本博多商人还混入进贡朝鲜的使臣队伍里,以朝贡之名发展走私贸易^[53],更有甚者,为了躲避朝鲜的贸易制裁,主导了一系列的“书契伪造”事件。其中有关使者“也次郎”的一则颇为典型,反映了日本商人书契造假,伪装成琉球使臣进贡后被识破的过程,而后朝鲜政府碍于对马岛主的颜面,对本次事件采取了纵容的态度^[54]。日本人绞尽脑汁追逐巨额利润,加上朝鲜政府的纵容,导致书契伪造事件愈加频繁,朝鲜官员甚至积累出了丰富的经验来鉴定书契是否伪造^[55],但也阻挡不了多方朝贡体系下走私贸易的繁荣。

以上总结了朝鲜获取明代青花瓷所有可能的途径和来源。就途径而言,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呈现出主流贸易形式的阶段变化:明中期以前,以明朝的朝贡赏赐为核心,还兼及使臣和边境人员的合法贸易;明中期,伴随着明朝的赏赐减少,走私贸易盛行,包括在朝贡体制下的使臣走私、商团走私,以及纯粹的边境人员走私。

就来源而言,大致可分为从明朝直接获取、从琉球或日本间接获取两类。朝鲜与明朝有海陆交邻的地理优势,官方也长期秉持“事大”外交,尊明防倭,所以青花瓷主要从明朝直接获取。两国交流虽然海陆并举,但除了因明初定都南京而走太仓海路,明晚期因女真威胁辽东而走登州海路,大多时间走的还是“北京—山海关—辽东—义州—平壤—汉城”这条成熟安全的陆路^[56]。15世纪中期开始,尽管日本和琉球主导的海上中间走私贸易非常发达,但并不完全适用于朝鲜的青花瓷贸易,这一特殊品的贸易依然延续传统的陆路模式。从表一私人贸易途径“正统十二年到正德四年”的几则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朝鲜进口青花瓷主要依托的是使臣在北京和辽东的贸易。成化十三年,贸易屡禁不止,僭越使用青花瓷的风气在朝鲜弥漫,官方也清楚地知道这些走私是通过使臣归国带来的,于是希望“时遣御史往察”来进行监督,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到了正德四年,北方边境的平安道、咸镜道军民的陆路走私依然频繁。

三、明与朝鲜青花瓷贸易的区域性、阶段性分析

明与朝鲜两国的青花瓷贸易总体具有明显单向流动的特征。尽管朝鲜在明初就已经会生产高质量的白瓷和釉下铁绘,最迟在15世纪中期就出现本土制作的青花瓷(韩国出土有青花书写的“景泰七年”铭的墓志)^[57],但制造青花所需的钴料长期是从中国进口,且经常求而未得^[58],制而不精,质量远不如景德镇瓷器,朝鲜青花到了18世纪才开始繁荣正说明了这点。这些因素决定了在有明一代,朝鲜对于青花瓷和钴料有着持

续的进口需求。

朝鲜输入青花瓷的区域特点表现在出土遗址性质、遗址区域分布两个方面:①上述出土品有明确遗址所属的可归纳为中央衙署(56件)、都城市场(20件)、王室寺庙(19件)、官窑遗址(11件)、贵族或富豪墓葬(8件)、倭馆(4件)、抗倭城堡(3件)、普通居址(2件)、贵族宅邸(1件)八类,由此比例观之,进口的明代青花瓷大部分是被朝鲜官方所垄断的,或由朝鲜王再赏赐给臣下。可随着“比闻勋戚贵近先自坏法,闾巷小民,亦相率而侈靡”的风气渐开^[59],一部分也在民间流通。至于倭人通过贸易或战争带来的青花瓷,应属少数;②从遗址区域分布和出土数量的比例来看,汉城(77件)、都城外及京畿道(61件)、庆尚道(15件)、忠清道(13件)、江原道(5件)、全罗道和济州岛(4件)。明青花瓷作为朝鲜权力和财富的象征主要集中在都城附近,而港口城市发现极少,佐证了第二部分论证的观点:朝鲜的明代青花瓷输入主要是通过陆路,而非海路。

阶段性特征视青花官、民窑的区别而有所不同。第一,由产品属性导致留存情况的不同。官窑,包括官搭民烧的产品,相较于民窑,有存世量少,沿用时间长等显著特点。第二,反映贸易形式的不同。官窑产品的流通主要体现的是明朝对于朝鲜的朝贡贸易,用于换取别国土产,而民窑更多体现的是私人贸易。

(一) 朝贡贸易

官窑或官搭民烧的青花瓷出土品仅见京畿道高阳淑慎公主墓一例,数量极其有限,且作为清顺治帝赏赐的明代宫廷旧藏,瓷器生产与向外流通存在比较大的时间差,不能反映明代的贸易流通情况。《朝鲜王朝实录》的史料价值高,记录时间长,内容全面而详细,其中还发现有图文对应“宣德官窑青花云龙白瓷酒海”的确证。通过对《朝鲜王朝实录》记载明皇帝向朝鲜赏赐或回赐的青花瓷条目进行全面系统的检索,我们可以窥得这一官方贸易的阶段性趋势。

表一朝贡贸易途径中的文献记录了宣德、景泰年间大明皇帝赏赐朝鲜王青花瓷的情况,除此之外,还有“正统十二年、顺治十二年”两则文献记载洪武或建文(朝鲜太祖、定宗)、永乐(朝鲜太宗)、正统(朝鲜世宗)四朝,成均馆获得了朝鲜王赏赐的青花瓷,这些青花瓷很有可能也是当时来自明朝。由此可知,官窑青花瓷的赏赐贸易主要集中于明代中期以前,在宣德时期尤为频繁,景泰元年的赏赐是恰逢朝鲜文宗登基,到了明代中晚期基本不见。朝鲜在有明一代,对于青花瓷的需求量一直很大,所以这种现象应该是伴随着大明国力的衰落,“厚往薄来”朝贡贸易的逐步下滑。至于韩国目前仍不见有旧藏、出土的明代官窑青花瓷,重要原因或许在于表一顺治十二年文献所揭示的,朝鲜历经明代末期的“壬辰倭乱”,王官府库的珍藏被倭寇洗劫一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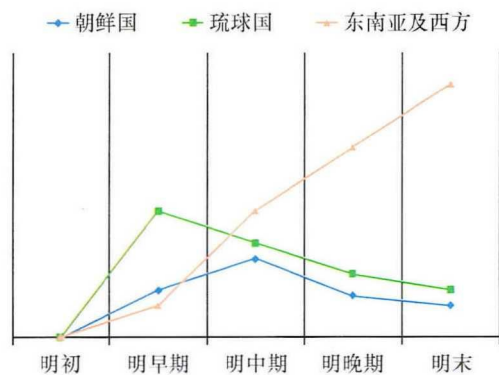
(二) 私人贸易

民窑青花瓷出土品较多,对出土品的统计可以了解私人贸易的阶段性趋势(表二)。

表二 朝鲜半岛出土明代民窑青花瓷分期后的数量统计

	明初	明早期	明中期	明晚期	明末
出土数量(件)	0	9	117	26	17
总数占比(%)	0	5.3	69.2	15.4	10.1

明初,景德镇民窑青花瓷基本为空白,无法满足外销市场需求;明早期,或者称为空白期,青花瓷的生产有了初步发展。“正统十二年”禁令前,部分产品通过合法的私人(使臣、边境军民等)贸易流入朝鲜,禁令之后,朝鲜官方积极响应,使得这一时期的贸易仍然萧条;明中期,青花瓷的生产进入繁荣期,极大刺激了朝鲜国的消费需求,外销量至此到达顶峰。尽管朝鲜的官方禁令在成化、弘治、正德时期每朝屡下,始终阻挡不了贵族及豪门巨富,甚至是平民僭越奢侈使用青花瓷器的风气,促进了北京到汉城一线陆路走私贸易的繁荣;明代晚期,青花生产继续繁荣,西方的新航路开辟将中国卷入了全球贸易当中,最终明朝于隆庆元年(1567年)解除海禁,允许私人远贩东西二洋,开放东南沿海的漳州月港,史称“隆庆开关”。但这些优势条件与朝鲜贸易的实际情况形成的巨大反差,一是因为朝鲜习惯通过使臣贸易,走相对安全的陆路从北京和辽东购买青花瓷,二是因为朝鲜人即使走海路,熟悉的也是山东登州港和江苏太仓港(登州蓬莱沉船和太仓樊村泾遗址发现有朝鲜的粉青沙器佐证了这一点),并非福建漳州港,所以隆庆开关对于习惯走陆路的朝鲜人来说意义并不大,这也是明代晚期外销流行的漳州窑青花瓷基本不见于朝鲜的原因。进一步究其反差原因,一个关联使臣贸易的历史事件值得关注——嘉靖会同馆“门禁”事件:嘉靖元年(朝鲜中宗十七年,1522年),因朝鲜通事金利锡在北京购买禁书,明朝官方开始给朝鲜使臣下达了禁足令,规定使臣不能像往常一样随意出入会同馆。这一禁令到后世虽屡有松弛,可到了明末也未见明显好转^[60]。嘉靖十四年(朝鲜中宗三十年,1535年),《嘉靖实录》载:“诏遣通事序班一人护送朝鲜国使臣出境。自后岁以为常,防其夹买私货也”^[61]。这一系列举措不仅极大限制了朝鲜使臣在北京购买青花瓷,而且让朝鲜感到国体受损,诱发了隆庆二年(朝鲜宣祖元年、1568年)朝鲜抵制明朝发布的公私贸易禁令^[62];明末,万历壬辰倭乱、天启丁卯胡乱、崇祯丙子胡乱,三次先后爆发的国际战争直接影响了东亚的政治、经济格局,加之明与朝鲜主流的陆上交通被女真人切断,导致对朝的青花瓷贸易与西方贸易的反差继续被拉大。



图一五 明代民窑青花瓷输出朝鲜、琉球、东南亚及西方的阶段性变化示意图

(笔者根据本文数据,张荣蓉、魏峻引文数据自绘)

从横向来看,明朝对于朝鲜的瓷器贸易,与对琉球^[63],对东南亚及西方^[64],也存在着明显的阶段性差异(图一五)。明早期,朝鲜虽与琉球一样享有明朝的外交特权。但不同的是,在明朝正统年发布青花瓷外销禁令后,朝鲜官方积极响应导致了贸易的缓慢增长,而琉球却凭借着中间国的优势大发横财,把从明朝获得的青花瓷转卖给东南亚和西方,带来了贸易的繁荣。明早期以后,伴随着西方全球化海上贸易的逐渐到来,以及明晚期的开放海禁,东南

亚及西方与明朝建立了直接的联系,贸易量急剧上升,而琉球的中转贸易地位却随之的一落千丈,在此期间,朝鲜的青花瓷贸易因为主要通过陆路交通,独立于琉球与西方的海上竞争体系,在各种政治力量的干预下夹缝求生。

四、结 语

囿于考古资料的限制,朝鲜半岛发现的明代青花瓷仅分布于韩国全境,主要为社会上层消费使用,可能的来源包括以使臣、边境军官、商人、平民等为运输主体的朝贡或私人贸易,有从明朝直接输入的,也有通过琉球和日本间接获取的。

明代是东亚海上贸易的一个繁荣期,但对于朝鲜输入的青花瓷贸易来说,存在着较大的特殊性。特殊性主要表现在,无论是朝贡还是走私,青花的来源都主要通过“北京—山海关—辽东—义州—平壤—汉城”的陆路交通从明朝直接获取,依托的主要人群是使臣团体,满足的是本国需求,反映了朝鲜以政治为主导的小规模青花瓷贸易模式,相对独立于琉球、日本、东南亚及西方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大规模海上竞争体系。

朝鲜输入青花瓷的三类途径:朝贡贸易、私人贸易、战争,且随时代的发展呈现出阶段性的变化。朝贡贸易,明早期以后不断衰落;走私贸易经历了明早期的缓慢增长,明中期出现繁荣,明晚期至明末受外交、战争的影响而走向衰落。

注 释

[1] [韩]中原文化財研究院. 동대문 운동장 유적 [M]. 충청북도: 中原文化財研究院, 2011: 28-76.

[2] a. [韩]한울문화재연구원.鐘路 清進 12~16地區遺蹟 [M]. 경기도: 한울문화재연구원, 2013: 215-241.

- b. [韓] 최종규 등. 서울 청진구역 광화문역 개선사업부지 유적 [M]. 경기도: 한울문화재연구원, 2017: 144, 153.
- c. [韓] 박정민. 조선 전기 한양 출토 중국 청화백자의 소비상황 연구 [J]. 야외고고학, 2013 (17).
- d. [韓] 박준형 등. 靑花靑畵 [M]. 서울: 한성백제박물관, 2023: 146-152.
- [3] [韓] 최종규 등. 서울 청진구역 종각역 개선사업부지 유적 [M]. 경기도: 한울문화재연구원, 2017: 131-328.
- [4] [韓] 단국대학교박물관. (整備, 復原을 위한) 慶熙宮址 發掘調査報告書2次 [M]. 서울: 慶熙宮址 發掘調査團 檀國大學校博物館, 1987: 209.
- [5] [韓] 한울문화재연구원. 서울 중구 다동 53-8번지 유적 [M]. 경기도: 한울문화재연구원, 2017: 84.
- [6] [韓] 국립중앙박물관. (국립중앙박물관 소장) 중국 도자 [M]. 서울: 국립중앙박물관, 2007: 314-317.
- [7] 同 [6] : 311.
- [8] a. [韓] 경기도박물관. 檜岩寺 [M]. 경기도: 京畿文化財團附設畿甸文化財研究院, 2001.
- b. [韓] 경기도박물관. 檜巖寺: 7·8단지 발굴조사 보고서Ⅱ, 유물도면·사진 [M]. 경기도: 경기도박물관, 2003: 314.
- c. [韓] 회암사지박물관. 고미경. 회암사지 출토 중국 도자기의 연대와 특징 [C]. 회암사의 도자기. 경기도: 회암사지박물관, 2015: 120-150.
- [9] [韓] 국립중앙박물관. 廣州郡 道馬里 白磁窯址 發掘調査 報告書 [M]. 서울: 國立中央博物館, 1995: 108.
- [10] [韓] 이화여자대학교. 廣州牛山里9號朝鮮白磁窯址 發掘調査報告 [M]. 서울: 梨花女子大學校出版部, 1993: 101-102.
- [11] [韓] 이화여자대학교. 中部高速道路建設預定地域 廣州朝鮮白磁窯止 發掘調査報告 [M]. 서울: 梨花女子大學校博物館, 1986: 119.
- [12] 陈天民, [韓] 金银珠, 吴闻达. 韩国淑慎公主墓出土遗物及相关问题研究 [C]. 中国古陶瓷研究第二十七辑——元明景德镇窑业与技术交流.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23: 271-281.
- [13] [韓] 강형태, 조남철, 한민수, 김우현, 홍지윤. 은평 뉴타운 유적 출토 유리구슬의 성분조성과 납동위원소비 [J]. 보존과학회지25권, 2009 (3).
- [14] [韓] 경기문화재단. 汶山 堂洞里 遺蹟: 문산 LCD지방산업단지 (당동지구) 문화재시·발굴조사. 본문2 [M]. 경기도: 京畿文化財團 京畿文化財研究院, 2009: 167-173.
- [15] [韓] 한울문화재연구원. 광고 신도시 문화유적 2. 광고택지개발사업지구내 1-2지구 문화재 발굴조사 [M]. 경기도: 한울문화재연구원, 2011: 146-149.
- [16] [韓] 기호문화재연구원. 華城 卧牛里 遺蹟1 [M]. 경기도: 기호문화재연구원, 2009: 67-74.

- [17] [韩]金英美.在韩国发现的明清瓷器的分期与特征[C].徐莘芳先生纪念文集(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301-332.
- [18] [韩]경기도박물관. 龍仁 壬辰山城[M]. 경기도:京畿道博物館,2000:40,48,132-133.
- [19] 资料来源于韩国博物馆电子数据库(<http://www.emuseum.go.kr/main>).
- [20] [韩]두류문화연구원. 창원 제포 유적:진해 웅동지구 진입도로 개설구간 내 유적 발굴(정밀)조사 약보고서[M]. 서울:두류문화연구원,2020:56.
- [21] [韩]국립대구박물관.(우리 문화속의)中國 陶磁器[M]. 대구:국립대구박물관,2004:183.
- [22] [韩]부산박물관. 천성진성:2016년 시굴조사 보고서[M]. 부산:釜山博物館,2017:32.
- [23] [朝鮮]국사편찬위원회. 朝鮮王朝實錄14[M]《中宗實錄》卷一四:“……倭船侵犯各鎮,累日不去,臣領兵船百二十五隻,圍討於加德島倭船隱泊處.倭船凡三十一隻,齊聲呼譟,揮刀拒我……” 서울:東國文化社,1955:547.
- [24] 同[19].
- [25] [韩]한국문화재보호재단. 淸州 龍岩遺蹟[M]. 서울:韓國文化財保護財團,2000:380-382.
- [26] 同[19].
- [27] 同[19].
- [28] [朝]국사편찬위원회. 朝鮮王朝實錄5[M]《世宗實錄》卷一三二. 서울:東國文化社,1955:304.
- [29] 陈冲.景德镇明代民窑青花瓷分期研究[D].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8.
- [30] [朝]국사편찬위원회. 朝鮮王朝實錄2[M]《世宗實錄》卷九. 서울:東國文化社,1955:523.
- [31] [朝]국사편찬위원회. 朝鮮王朝實錄3[M]《世宗實錄》卷四一. 서울:東國文化社,1955:138.
- [32] 同[31]:139.
- [33] [朝]국사편찬위원회. 朝鮮王朝實錄3[M]《世宗實錄》卷四三. 서울:東國文化社,1955:164.
- [34] [朝]국사편찬위원회. 朝鮮王朝實錄3[M]《世宗實錄》卷四四. 서울:東國文化社,1955:185.
- [35] [朝]국사편찬위원회. 朝鮮王朝實錄3[M]《世宗實錄》卷四五. 서울:東國文化社,1955:189.
- [36] [朝]국사편찬위원회. 朝鮮王朝實錄3[M]《世宗實錄》卷四六. 서울:東國文化社,1955:203.

- [37] [朝] 국사편찬위원회. 朝鮮王朝實錄3 [M] 《世宗實錄》卷四九. 서울: 東國文化社, 1955: 246.
- [38] [朝] 국사편찬위원회. 朝鮮王朝實錄5 [M] 《世宗實錄》卷一一七. 서울: 東國文化社, 1955: 35.
- [39] [朝] 국사편찬위원회. 朝鮮王朝實錄6 [M] 《文宗實錄》卷三. 서울: 東國文化社, 1955: 268.
- [40] 同[39]: 268.
- [41] [琉球] 蔡铎等. 历代宝案 [M] 第一集卷四一. 台北: 精华印书馆, 1972: 1319-1320.
- [42] [朝] 국사편찬위원회. 朝鮮王朝實錄36 [M] 《孝宗實錄》卷一五. 서울: 東國文化社, 1955: 22.
- [43]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 明英宗实录 [M] 卷一五八. 北京: 中华书局, 2016: 3074.
- [44] 同[38]: 52.
- [45] [朝] 국사편찬위원회. 朝鮮王朝實錄9 [M] 《成宗實錄》卷七七. 서울: 東國文化社, 1955: 430.
- [46] [朝] 국사편찬위원회. 朝鮮王朝實錄13 [M] 《燕山君日記》卷二九. 서울: 東國文化社, 1955: 313.
- [47] [朝] 국사편찬위원회. 朝鮮王朝實錄14 [M] 《中宗實錄》卷七. 서울: 東國文化社, 1955: 308.
- [48] [朝] 국사편찬위원회. 朝鮮王朝實錄3 [M] 《世宗實錄》卷四四: “……尹鳳自其弟重富之第, 詣闕……” 서울: 東國文化社, 1955: 184.
- [49] [朝] 국사편찬위원회. 朝鮮王朝實錄2 [M] 《世宗實錄》卷二七: “尹鳳謂右副代言李臺曰……予自九岁, 育于李彬家, 二十余人朝, 迨今安荣, 皆其賜也……” 서울: 東國文化社, 1955: 654.
- [50] [朝] 국사편찬위원회. 朝鮮王朝實錄2 [M] 《世宗實錄》卷二七: “序班崔真詣闕, 上引见于庆会楼下. 贵〔真〕进磁鍾一事, 赐毛衣冠土豹皮一张、貂鼠皮三十张、石灯盏一事、麻布十四、人参三十斤、彩花席十张. 命左副代言郑渊馈之” 서울: 東國文化社, 1955: 140.
- [51] [朝] 국사편찬위원회. 朝鮮王朝實錄3 [M] 《世宗實錄》卷四五: “……鳳求請之物, 二百餘櫃, 每荷一櫃, 用八人, 荷櫃軍自太平館至沙峴, 絡繹不絕. 使臣求索之多, 未有甚於此時者也” 서울: 東國文化社, 1955: 189.
- [52] (明) 汝楫. 礼部志稿 [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册五九七卷三十六: “各处番人朝贡, 领赏之后, 许令会同馆开市三日或五日. 惟朝鲜、琉球不拘期限.” 台北: 商务印书馆, 1983: 597-676.
- [53] [朝] 국사편찬위원회. 朝鮮王朝實錄5 [M] 《世宗實錄》卷一二一: “……宗貞盛所示日本國王教書內, 使臣船一. 今來船則三, 其二非日本所送明矣……乃博多興利之人也. 興利人, 不可與使臣同處……” 서울: 東國文化社, 1955: 78.

- [54] a. [朝] 국사편찬위원회. 朝鮮王朝實錄12 [M] 《成宗實錄》卷二七九: “戊辰, 琉球國王尙國遣梵慶來聘. 其書契曰: 琉球國王尙國拜覆朝鮮國王殿下……又遣也次郎來聘. 書契曰……兩使同日入京” 서울: 東國文化社, 1955: 324.
- b. [朝] 국사편찬위원회. 朝鮮王朝實錄12 [M] 《成宗實錄》卷二七九: “辛未, 承政院啓曰: 琉球國使臣, 皆非本國人, 乃中間興販之徒. 臣等取往年書契, 與今來書契觀之, 印文頓殊. 也次郎去歲來朝, 是必居九州之間, 偽造圖書, 興利爲事者也” 서울: 東國文化社, 1955: 343.
- c. [朝] 국사편찬위원회. 朝鮮王朝實錄12 [M] 《成宗實錄》卷二七九: “禮曹啓曰: 也次郎, 去辛亥年來我國, 前年三月還歸, 今者又來, 其水路遠近, 未得詳知, 但每年來往, 臣等亦疑其僞. 然前此, 彼之遣使有僞者, 我雖洞知之, 猶不與辨而接待之, 況國家厚待對馬島主, 凡倭使之來, 皆經由對馬島, 受路引而來, 今不接待, 則島主亦必愧之……” 서울: 東國文化社, 1955: 343.
- [55] [朝] 국사편찬위원회. 朝鮮王朝實錄12 [M] 《成宗實錄》卷二八八: “今審琉球國書契, 大概行文與倭書同, 一疑也. 首稱禮曹大人, 違前例, 二疑也. 前者用半印符信, 而今稱新賜別符, 三疑也……” 서울: 東國文化社, 1955: 494.
- [56] 王其渠. 明实录·邻国朝鲜篇资料 [M] 《崇祯长编》卷八: “登莱巡抚孙国祯陈六事……一议改朝鲜贡道……今辽左沦没, 贡使自铁山开洋, 直抵登州, 顺风不过三日程耳. 较鸭绿抵前屯, 更为近便. 前屯至京, 必由山海……”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 1983: 579.
- [57] [韩] 강경숙. 한국도자사 [M]. 서울: 예경, 2012: 399.
- [58] [朝] 成俔. 大东野乘 [M] 卷之二, 《慵斋丛话》卷之十: “至世祖朝. 雜用彩磁. 求回回青於中國. 畫樽壘盃觴. 與中國無異. 然回青罕貴. 求中國亦未多得. 朝廷議曰. 中國雖窮村茅店. 咸用畫器. 豈皆回青所畫. 應有他物可畫者. 訪於中國. 則皆曰此土青也. 然所謂土青者. 亦未求得. 由是我國畫磁器尠少.” 서울: 민족문화문고, 1985: 654.
- [59] [朝] 국사편찬위원회. 朝鮮王朝實錄9 [M] 《成宗實錄》卷七七. 서울: 東國文化社, 1955: 430.
- [60] 李善洪. 明代会同馆对朝鲜使臣“门禁”问题研究 [J]. 黑龙江社会科学, 2012 (3).
- [61] 王其渠. 明实录·邻国朝鲜篇资料 [M].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 1983: 258-259.
- [62] [朝] 국사편찬위원회. 朝鮮王朝實錄21 [M] 《宣祖實錄》卷二: “甲辰, 朝講. 正言權徵啓曰: 我國以公私貿易, 卜馱至多, 中原一路, 困弊不支. 中國亦賤待我使臣, 不得與琉球使臣爲比. 蓋以琉球簡, 而我國煩故也. 請今後公貿易, 至於遼東爲之, 勿復輪至燕京, 一以除一路轉輸之弊, 一以洗辱國之恥.” 서울: 東國文化社, 1955: 193.
- [63] 张荣蓉. 琉球王国首里城出土元明时期龙泉窑青瓷与景德镇青花瓷研究 [D]. 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20.
- [64] 魏峻. 16—17世纪的瓷器贸易全球化: 以沉船资料为中心 [J].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22 (2).

Research on the Ming Dynasty Blue and White Porcelain Discovered in Korean Peninsula and the Related Issues

KIM Eunju CHEN Tian-min

Blue and white porcelains of the Ming Dynasty were important commodities in global tribute and smuggling trade, especially for neighboring the Joseon Dynasty, which was highly sought after by different ranks. Based on the regional and chron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archaeological and historical documents, this paper reveals that Joseon, unlike Ryukyu Province (Okinawa), Japan, Southeast Asia, and the West, was not actively involved in large-scale maritime trade, focusing on small-scale land-based envoys' trade from Beijing to Hanseong (Seoul). The tribute trade predominated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and the smuggling trade rose since the mid-Ming Dynasty. By the late Ming Dynasty, the trade gradually decline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diplomacy and war.